

城与乡的反差：农村青年就业的现实审视与调适

——基于 CGSS2015 数据分析

陈斯诗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青年劳动力,这部分群体是否能顺利就业关系着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 CGSS2015 数据分析表明,农村青年群体目前面临就业率较低、就业不稳定、就业质量不高和社会保障不足等困境。经分析,农村青年就业困境的形成,一是性别的影响,农村女性的失业率较高;二是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对比城市青年,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青年,致使农村青年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差;三是家庭背景的影响,家境较差的农村青年文化资本匮乏、教育资源少和就业信息缺乏,使得农村青年就业较困难;四是流动因素的影响,对比流向城市的农村青年群体,留在农村的青年群体就业率更低。

关键词:农村青年;就业困境;城乡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19)04-0035-09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图 1 所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发生着显著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从 1978 年的 70.5% 下降到 2017 年的 27.0%,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稳步增长,2017 年分别达到 28.1% 和 44.9%。这说明随着市场

转型、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已快速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在逐步增加。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的青年劳动力,他们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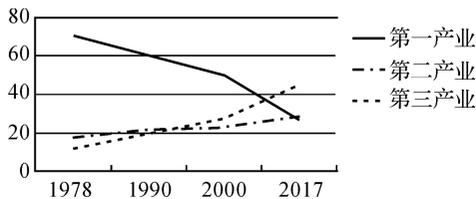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就业人口结构变化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8。

收稿日期:2019-06-17

基金项目:2019 年福建省党校系统中特理论基地课题“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研究”

作者简介:陈斯诗(1986—),女,汉族,福建安溪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青少年社会学。

在非农领域就业,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能否顺利进行,关系着青年个人成长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1]。

一方面促进农村青年顺利就业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前农村青年还面临着严峻就业形势的挑战。根据中国社科院对2018年就业形势的调查,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世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科学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下,我国目前就业失业率在5%左右,并且仍面临一系列普遍压力,如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等挑战^[2]。尤其对农村青年来说,青年这一人生阶段使得他们未能准确定位、缺乏社会和工作经验^[3],并且求学时期长期处于农村又使得他们容易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缺少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较难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导致在应对“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即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低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减少^[4]的挑战时,面临更多结构性失业的风险。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群体的就业压力,如有学者认为目前涉及农村青年的欠薪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呈增长态势,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仍面临较大压力;短期性失业问题凸显,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农村青年陷入“贫者更贫”的恶性循环^[1]。对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就业的这部分农村青年,有学者认为,由于这部分群体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他们很难在城市中真正立足^[5]。政治上,流动的农村青少年无法完全市民化,呈现“半市民化”;社会上,他们一方面受到一些不平等待遇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本地居民的不认同;经济上,他们长期处于不稳定的、非正式的、短期的就业状态^[6]。

学者关于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及其就业

问题的研究基本属于区域性研究。通过大范围的数据调查较全面掌握农村青年在向城镇就业转移过程中的新特点、新问题,并深入挖掘产生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农村青年就业问题、提高就业质量的对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通过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数据调查,从定量视角来挖掘这一群体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化的对策建议。

二、农村青年群体的就业现状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和数据中心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这项调查从2003年开始至今,符合严格的科学抽样标准,在国内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CGSS2015全国调查数据总样本为10968,笔者根据研究目标,从中筛选出农村青年就业或待业群体。首先筛选出农村户籍,其次筛选出年龄从22岁到30岁的青年样本,再次剔除“正在学习”的样本。经过这三次筛选,从10968个样本中选出符合农村青年身份的样本是409个。本研究拟在城乡对比视角下研究农村青年群体,所以也筛选出参照群体城市青年。首先筛选出城市户籍居民,其次筛选出年龄从22岁到30岁的青年样本,再次剔除“正在学习”的样本。经过三次筛选,从10968个样本中选出符合城市青年就业或待业的样本量共282个。为了对全体青年有一个总体了解,也筛选出了全体青年样本,把筛选出的农村青年样本和城市青年样本加在一起,样本总量为691个。

(一)农村青年群体失业率相对较高

从表1可知,农村青年的就业人数为249人,未就业的为160人,就业率为60.9%;城市青

年中就业人数为216人,未就业为66人,就业率达76.6%。对比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可知,农村青年的就业率比城市青年低了15.7%,这也意味着农村青年失业率较高。这和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对比城市青年,农村青年拥有的教育资源较少,增加劳动技能的途径也较为缺乏。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自身就业技术的局限和市场对高技术需求的增加,农村青年很有可能在這種矛盾关系的变化下失业。

表1 2015年青年就业情况对比描述

项目类别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总样本
就业人数/人	249	216	465
未就业人数/人	160	66	226
就业率/%	60.9	76.6	67.3
N	409	282	691

(二)农村青年群体就业稳定性差,短工化现象普遍

就业稳定性关系着农村青年生活的稳定和事业持续发展。劳动合同是从法律法规上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劳动者可以享受的权利,是保证就业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处,笔者选取了“是否签订正式书面劳动合同”作为测量农村青年群体就业稳定性的一个指标。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您目前工作是否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如表2所示,系统缺失值是160个,因为“未就业”的人没有填答此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有146个,占58.6%;“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20个,占8.0%;“签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75个,占30.1%。从数据中可知,通过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保障就业者稳定就业的比例仅30.1%,比例较低。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带来许多金钱之外的好处,例如获得他人的尊敬和建立自尊。相反,不稳定的工作会使得就业很难成为经济安全和基本生活的保证,“人们在不稳定工作中,越努力工作,就越迷茫”^[7]。数

据分析可知,就业稳定性差是农村青年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农村青年没有签订固定合同。结果导致,一是农村青年很容易在不稳定的工作中感到迷茫,无法建立需要的他人尊重和自尊;二是很难从法律方面来保障流动青年群体的合法权益,当这一群体在就业方面受到侵害时,无合同可依,维权较为困难;三是就业稳定性差意味着这一群体经常从事短期简单重复性劳动,在劳动技能方面无法得到积累和增长,导致日后长期的发展受限。

表2 2015年农村青年签订就业合同情况

项目类别	人数/人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法回答	8	3.2	3.2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46	58.6	61.8
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	8.0	69.9
签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75	30.1	100.0
总计	249	100.0	

(三)农村青年群体就业质量不高

就业质量可以通过系列指标的综合从总体上反映就业的优劣。参照李军峰的研究^[8],笔者认为就业质量包括从业者的工作收入、个人发展前景、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工作压力。通过询问被访者“工作是否收入高”来测量收入情况,“是否升职机会大”测量发展前景,“是否有趣”“工作压力是否大”“周末是否要加班”来测量工作的满意度和工作压力。

分析数据可知,在有正式工作的个体中,认为“主要工作收入高”的仅为20.6%,79.4%的农村青年不认为自己收入高;认为“主要工作升职机会大”的仅为14.7%,剩余85.3%的农村青年不认为工作升职机会大;认为“工作有趣”的仅35.3%,剩余64.7%的农村青年不这样认为;认为“经常感觉工作压力大”和“有时感觉工作压力大”的,合计超过60%;在询问是否需要周末工作时,回答“一直如此”的占26.5%,回答

“经常”的占 44.1%，回答“有时”的占 17.6%，将近 90% 的农村青年是需要周末加班的，可知上班时间较长。从被访者对这五个指标的回答，我们发现，农村青年的就业质量不高，这一群体的青年认为其收入、升值空间和趣味性的满意度都是较低的，并且工作压力较大，周末加班较为频繁。

（四）农村青年就业保障不足

农村青年在就业质量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遭遇劳动风险时需要保险对这一群体给予保护。目前的保险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我们平时说的五险一金；商业保险是劳动者个体的参保行为，保障范围更广，在劳动者面临风险时，可以提供更多的保障补充。无论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其中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是至关重要的，故在此，笔者考察了医疗保险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和商业性的养老保险等四个项目。在 409 个样本中，参加医疗保险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有 346 个，没有参加的为 60 个，其余的未回答，参保率为 84.6%。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有 149 个，没有参加的为 240 个，其余的未回答，参保率为 36.4%。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参加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仅 29 个，占 7.1%；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的仅 11 个，占 2.7%。可见，在国家政府推动下，农村青年群体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较为普及，参保率高达 84.6%。但是其他三个类别就非常不乐观，所以总的来说，农村青年的就业保障还是非常不足的。

三、影响农村青年就业的因素探讨

从失业率、工作稳定性、工作质量和就业保障来看，农村青年群体面临着失业率较高、工作

不稳定、工作质量偏低和就业保障不足这些方面的困境。基于以往的研究，产生就业困境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自身因素和家庭因素。并且由于农村青年在就业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从农村流向城镇这样的地域转移，所以本项研究也将“是否流动”作为一个可能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探讨。为了凸显出农村青年的农村身份，本文设计在城乡对比视角下，通过对比城市青年群体和农村青年群体，探讨农村户籍身份给农村青年就业带来的影响。

在农村和城市对比视角下，通过回归分析，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流动情况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农村青年就业的变量。

（一）因变量描述

评价青年就业情况的指标很多，像第一部分探讨的“就业率”“就业质量”“就业保障”和“职业稳定性”等。笔者选取“是否就业”作为因变量，因为是否能顺利就业是青年就业现状最为根本、最基础的问题，也是目前实践中和学术界评价就业形势最为重要的指标。为了进一步分析为何农村青年就业问题较大，笔者以“是否就业”为因变量，对比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这两个不同样本群体，深入分析影响青年顺利就业的因素，建立三个逻辑回归模型。模型 1 是农村青年样本回归模型，模型 2 是城市青年样本回归模型，模型 3 是全体青年样本回归模型。在回归分析中，因为“是否就业”是一个二分定类变量，需要给这一变量赋值，使其成为虚拟变量才能放入回归模型，具体赋值为：1 = 就业，0 = 未就业。

（二）主要预测变量描述

按照之前的研究设计，笔者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流动情况三个方面来考察影响就业的因素。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流动因素即为

“是否流动”。

从个体因素看,如表 3 所示,就主要的预测变量“受教育程度”而言,农村和城市青年存在较大差距,城市青年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农村青年。农村青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 44.8%,城市青年“初中及以下”仅 13.2%;在较高层次的受教育程度方面,农村青年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本科”的占 25.7%,城市青年“大专及本科”的占 60.1%,城市青年远高于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回归方程中,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可直接当作连续变量处理,“小学及以下”赋值为“0”,“初中”赋值为“1”,“职高、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2”,“大专及本科”赋值为“3”。

从家庭因素看,对于主要预测变量“家庭人均年收入”这一指标,农村青年的家庭和城市青年的家庭也存在较大差距。为了计算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情况,笔者用个案的“2014 年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得出“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

青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 22122 元,城市青年的家庭每人年均收入为 40226 元。两个群体的这一指标差距近 2 万元,可见城乡青年家庭的收入差距还是较大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定距变量,按照常规对收入取对数放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即可。

从流动情况看,农村青年的流动意味着从农村来到城市,一般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例如城市融入、文化适应等,而且来到城市后受到的家庭庇护也少了,所以是否流动可能会给农村青年带来就业方面的困难。城市青年的流动一般是从一个城市向另外一个城市的流动,这一群体面临的流动障碍小一些。从表 3 中可知,农村青年的流动比例占 24.0%,城市青年的流动比例为 21.9%,农村青年的流动比例稍高于城市青年。“是否流动”是一个定类变量,所以在放入回归模型时需要进行虚拟处理,“流动”赋值为“1”,“不流动”赋值为“0”。

表 3 主要预测变量

项目类别		农村	城市	总体
个体因素	性别			
	男性	189(46.2%)	146(51.8%)	335(48.5%)
	女性	220(53.8%)	136(48.2%)	356(51.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6(3.9%)	3(1.1%)	19(2.8%)
	初中	167(40.9%)	33(12.1%)	200(29.4%)
家庭因素	职高、高中、中专、技校	120(29.4%)	73(26.7%)	193(28.3%)
	大专及本科	105(25.7%)	164(60.1%)	269(39.5%)
	家庭人均年收入	22122 元	40226 元	29510 元
	是否流动			
流动因素	流动	98(24.0%)	61(21.9%)	159(23.1%)
	不流动	310(76.0%)	218(78.1%)	528(76.9%)

注:括号内为有效百分比。

(三) 回归模型和结果

经过前文分析,笔者确定了本次多元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依次为:个体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家庭每人年均收入取

对数),流动因素(是否流动)。因变量“是否就业”是二分变量,可以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分析,建立起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表4 影响个体是否就业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1:农村样本		模型 2:城市样本		模型 3:总样本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OR)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OR)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OR)	
个体因素	性别	1.502	4.490****	-.126	.881	.897	2.452****
	年龄	-.001	.999****	.244	1.276***	.051	1.052
	受教育程度	.508	1.663	-.232	.793	.393	1.481****
家庭因素	家庭人均 年收入	1.573	4.821****	1.595	4.929****	1.668	5.304****
流动情况	是否流动	.939	2.558**	.488	1.629	.706	2.026**
	常数	-7.850	.000	-11.710	.000	-9.062	.000
	预测正确百分比	76.4%		79%		77.1%	
	χ^2	358.162****		211.760****		597.461****	
	N	409		282		691	

资料标注: *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

总体来说,本研究所建的三个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解释力度均较高。以预测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每人年均收入取对数、流动情况为自变量,因变量为“是否就业”。模型1是农村青年样本,经统计学检验 $\chi^2 = 358.162, p < 0.001$,逻辑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做模型拟合分类,符合率为76.4%,即通过预测变量判断是否就业的准确率可以高达74.6%,整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自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强。模型2是城市青年样本,经统计学检验 $\chi^2 = 211.760, p < 0.001$,逻辑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做模型拟合分类,符合率为79%,整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自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强。在总体样本中,模型的指标和解释力度也较强。可见,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是否流动三个方面来探讨影响就业的原因是较为合理的,可以较准确挖掘出影响就业的原因。

第一,性别对青年是否就业的影响在城市青年群体和农村青年群体上的影响力是大不相同的。性别对农村青年的影响很大,而对城市青年的影响并没有统计的显著性。在农村青年群体的模型中,性别对个体是否就业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预测系数OR值达到4.490,并呈现高度显著性。数据表明,男性比女性的就业比例高

4.490倍,即农村青年群体中,男性远远比女性更好就业。但是在城市群体中,男性女性的就业比例没有统计上的差别。从两组数据的对比可知,农村青年女性存在就业困难,而城市青年女性这个问题不严重。问卷中询问农村青年群体未就业的原因时,在未就业的160个个案中,仅41人作了回答,回答“因为料理家务而没有工作”的有19个,占据了未就业人数的近一半,并且这19个样本都是女性。也就是说料理家务已经成为女性未就业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男性没有因为料理家务而未就业。可见,家庭事务已经成为影响男女平等就业的一项重要因素。

以往的研究表明“女性就业数量下降,就业能力下降,就业愿望降低,就业层次降低,就业压力加大”^[9],主要原因是法律、政策层面对女性的就业保护不够^[10]。本项研究发现,女性中存在就业困境的群体主要是农村女性,这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因此应该突出对农村青年女性的关注程度。在探讨如何解决问题时,笔者发现从宏观的制度层面考虑女性就业保护时,也需重视女性未能就业的具体个人原因。女性劳动参与对其自身、家庭以及社会都有重要意义^[11]。然而,女性的家庭照顾责任与工作经常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指,照料老人或是照顾子女都

会对女性劳动参与带来负面影响,对社会性别平等、女性本身以及家庭福利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12]。女性的家庭照顾贡献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被家庭、社会所认同,社会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继续就业支持力度不够,需要市场、政策的进一步支持。

第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就业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影响体现在农村和城市青年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上。单纯从农村青年或城市青年的群体内部来看,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在模型1和模型2中,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是否就业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可以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是否就业在农村青年或城市青年群体内部,影响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3中,也就是把农村青年群体和城市青年群体放在一起考察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个体的就业影响非常显著,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就业比例越高。结合三个模型,我们可得出,城乡青年受教育程度的较大差距(这一差距我们在介绍自变量时已经阐述),会使得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就业的影响的显著性增强。以往研究表明,“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和质量不高会严重影响其就业之路,导致其走向就业困境”^[13],受教育程度即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之间青年受教育程度的较大差距会使得两个群体就业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农村青年群体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映出来的社会深层原因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第三,家庭因素这一预测变量对农村和城市青年群体的就业情况均有着显著影响。自变量“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这一个指标在三个回归模型中均有着显著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存在固化的趋势。有关研究发现,“背景”“关系”“资源”“人脉”等对青年就业情况起了决定性作用^[14]。

这样的结论和本项研究的发现是较为一致的,在回归模型中,家庭因素确实对青年就业存在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将城乡群体放在一起对比时更加明显,正如在模型3中显示的家庭因素的影响力的系数比模型1和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大。在前文分析自变量的时候发现,在家庭人均年收入这一指标上,农村青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比城市青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少近2万元,这也使得农村青年由于自身家庭因素的弱势而导致在就业职场上存在较弱势的地位。这样的影响机制既会使得上一辈的弱势地位影响到就业,也使得下一辈传递了这种弱势地位,这是阶层固化和贫困传递的一个社会现象。

第四,流动情况这一指标对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的影响是不同的。是否流动对于城市青年来说无显著影响,而对农村青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向城市的农村青年群体就业比例高于仍留在农村的青年群体。大多数学者和媒体的关注热点一般是流向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困境和城市融入困境,而对仍留在农村的这部分青年关注度较少。流向城市的农村青年虽说面临着进入城市的各种挑战,例如文化融入、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但是由于城市中的就业岗位更多,所以仍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留在农村的青年群体可选择的就业主要是务农和进入地处乡镇的企业打工。从客观上看,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务农所需的劳动力剧减,务农机会也随之减少。从农村青年的主体意愿出发,大多数农村青年如有其他就业机会,也不希望务农。农村青年更倾向选择在乡镇企业打工,但从全国范围看,乡镇经济普遍不景气,可提供给农村青年的就业岗位并不多。由于务农和乡镇企业所需劳动量的限制,留在农村的就业压力是大于流向城市的,流动是目前农村青年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主要途径。但是从乡村振兴战略来说,农村要振兴,一定要留住这部分劳动能

力强的青年群体,如果人才继续流失,农村只剩下老弱妇群体,振兴便无从谈起。

四、对策建议

基于回归分析中发现的影响农村青年就业困境的四个主要原因,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四个对策,期待可以成为部分解决农村青年就业困难的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第一,在农村青年就业存在困境的情况下,农村女性青年的就业困境显得尤其严重。前文的分析可知,性别对就业的影响只存在于农村青年群体,而不是城市青年群体。这是由于城市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较为深入人心,并且城市的女性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更强,如在职场领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也能较为自主地采取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相对来说,农村女性由于农村传统男女不平等观念的束缚,自身文化程度较低的原因,就业存在较大困难。农村女性未就业的最主要原因是“料理家务”,这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男性女性传统的分工观念,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观念限制了农村女性顺利进入职场,这样的情况在二胎政策全面实施之后很有可能更加严重。

一方面,需要从法律、政策上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一是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合法权益,赋予女性较为充足的休产假权利,允许女性产后有照料婴儿的时间,并且产假结束后能顺利继续就业。二是加强老年人养老市场化的推进。照顾老年人也是目前女性家庭照料的一项主要内容,加强养老市场化和专业化服务,可以使女性从这一项重任中得到缓解。三是加强对女性家庭照料服务的经济贡献认同。政策层面对女性家庭照料的经济贡献的认同可以从减税上着手进行相关政策的研究。四是鼓励公共事业领域提供部分时间更为自由的职业供需要料理家务的女

性从事,让更多女性在料理家务的同时可以在经济市场领域根据自身优势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教育、宣传,改变传统的社会分工观念,更多地把女性从繁忙的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倡导男性也分担相应的家庭事务。从观念上改变整体社会对女性料理家务产生的市场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认同,并强化男性也需承担起相应的家庭料理责任的认识。

第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和城市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仍需要大力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缩小农村和城市教育水平的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认为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文化资本可以产生经济效益^[15]。农村青年由于文化资本的缺乏,造成就业困境,从而阻碍了经济效益的产生。笔者认为,从教育入手,是解决农村青年就业困难的一个根本途径,可以缓解户籍导致的劳动技能上的差距。这也是农村青年最为关心的事情,在调查中询问农村青年“您认为目前政府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哪一方面需要加强发展”时,按重视程度排序,被访者认为政府最需要加强发展的公共服务是“劳动就业”,占19%;排第二的是“住房保障”,占14.9%;第三是“公共教育”,占13.4%。从农村青年的回答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群体对“劳动就业”服务和“公共教育”的渴望和需求。城乡教育资源存在明显差距,客观上没办法快速改变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推进职业教育、短期技术培训、就业指导、网络教育等渠道,先解决一部分问题和困难。

第三,家庭因素也是影响农村青年就业的重要因素。首先,家庭因素是通过影响农村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来影响就业的,即家境好的家庭可为青年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从而促使农村青年积累较高的人力资本,提高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

其次,家庭因素可通过影响农村青年的社会资本来影响就业,即家境好的家庭将提供给青年更多有效人际关系。同时,农村青年目前主要就业方式是亲戚、朋友的介绍,青年拥有较多有效的人际关系,将大大提高就业机会。因此,政策上就需从这两方面缩小处于弱势的农村青年的差距,一是平衡公共教育资源,为家境困难的青年提供救助机制;二是建设更多就业咨询、就业服务机构,为缺乏网络资源的农村青年提供就业渠道和信息。

第四,提高对留在农村发展的这部分青年的重视和关注。通过数据分析,相比流向城市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发展的这部分群体的就业率更低。随着产业化结构发展的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所需劳动力是大幅度减少的,并且地处农村的企业所需劳动力有限,农村青年留在农村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大。首先,应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富有劳动能力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其次,完善农村青年的就业扶持政策,提高服务水平。从金融上讲,针对农村青年创业行为提供资金、贷款方面的支持和便利。从就业能力讲,增加农村青年的就业培训。从公共服务上讲,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需要起到兜底作用,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来保护农村青年就业后的合法权益;同时,推进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普及。再次,从思想上改变农村青年认为的“回农村没出息”这一个消极话语的影响^[16],引导农村青年在农村的创业就业中实现自我价值,突破乡村振兴人才缺失的困境。

参考文献:

[1]陈琪.浙江省衢州市农村青年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D].杭州:浙江大学,2017.

- [2]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25.
- [3]王文涛.大学生就业形势现状及解决途径[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35):143-144.
- [4]杜传忠,许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18(2):68-74.
- [5]张卫华.农村青年就业困境成因及对策[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
- [6]孙哲,张红斐.超大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与流动青少年的就业困境——基于广州与上海的比较[J].青年学报,2017(1):59-66.
- [7]王程韡,杨坤韵.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J].社会,2019(3):93-122.
- [8]李军峰.就业质量的性别比较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6):1-7.
- [9]田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 [10]张永红.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 [11]吕利丹.新世纪以来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6(6):109-117.
- [12]董晓媛.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09(6):61-68.
- [13]江小敏,陈沙麦.文化资本视角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探索——以福建省福州市4所高校为例[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8(5):57-61.
- [14]张阳.阶层固化背景下大学生弱势群体就业的供给侧改革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9):40-45.
- [15]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0,192.
- [16]张文婷,卫甜甜.“文化落差”与身份重构——基于返乡创业大学生的研究[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9(3):14-20.

(责任编辑:卫甜甜)